

如何读中国这本“天书”

○ 胡鞍钢

我把研究中国称之为在读一部“天书”，这部“天书”让你读得非常兴奋，同时让你难以读懂。国情研究，或者中国学研究，还是一条非常长的治学之路，任重而道远。



胡鞍钢

1953年生，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十二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减灾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环保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曾出版各类专著、编著图书62本，学术论文近300篇，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复旦光华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励。

国情研究是提供公共知识

在海外，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是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或学术领域，它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学”或“汉学”（Sinology），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涉及到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从国际范围内就当代中国进行的学术对话和学术竞争。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社会的封闭，国际学术界无法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and 调查，当代中国学实际上是“中国观察”（China Watching）或“中国猜测”，而不是真正的“中国研究”，并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往往将其研究作为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应用领域而已。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学才开始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学科，世界各国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之间开展高水平的真正平等的学术对话。由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使得“当代中国研究”对国际上优秀的学者更加具有吸引力。

在国内，我们把当代中国研究叫做“国情研究”。我称之为公共知识，就是研究和提供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生态环境变化以及对外开放的系统知识和较为全面的知识。我们对这种知识的研究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是整体性的森林式的研究，不仅要看到树木（企业或个人）的微观变化，而且看到整个森林（社会和国家）的宏观变化；不仅要看一个方面的变化，而且要看多方面的变化和相互关系，以对当代中国做出专业化的、全面的、系统的和动态的研究。与此同时，我们也频繁地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交流和平等对话，既是交流者，也是竞争者，既是对话者，也是挑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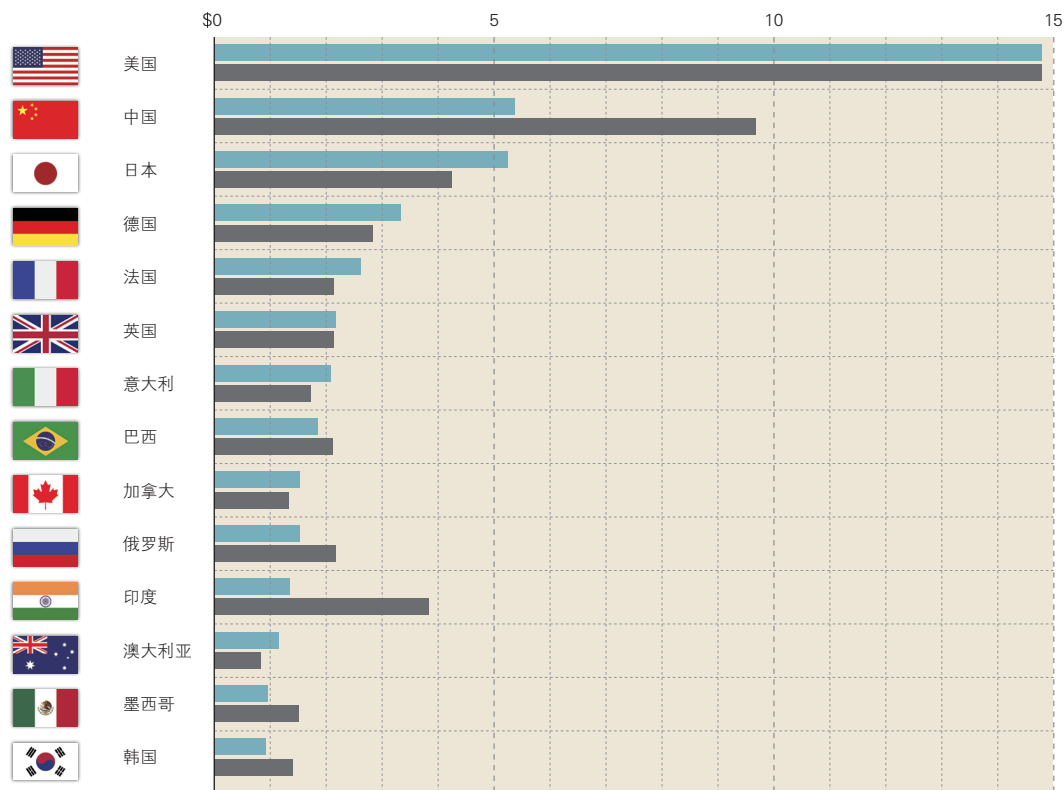
研究国情知识就是提供一种典型的公共知识，这种知识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是公共

超越日本 201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3711美元，世界排名96位

数据：201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GDP

■ 汇率计算法 ■ 购买力平价计算法 (单位：万亿美元)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预测报告

产品，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公共服务对象，发挥不同的知识服务功能和作用。

首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简称“国情研究所”）编辑的《国情报告》主要是针对国内的决策者和政府相关部门，从1998年开始内部发行，至今已经出版了900多期，既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也包括海外中国研究（主要是翻译和介绍），逐渐成为决策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反映了国情研究的公共政策咨询思想库作用。

其次，国情研究所也出版关于国情研究的系列学术著作（包括专著、合著），不断发表前沿性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是针对国内学术界。2000~2005年CSSCI（人文社会科学中文文献索引）收录我个人或与他人合作的学术论文108篇，同期CSSCI引用（不包括自引用）1404篇次，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方面排前列。这反

映了国情研究的学术引领作用。

再有，就是在清华大学授课传播国情研究知识。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是非常有限的，我来到清华大学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优秀的当代中国研究人才，在国外称之为“中国通”。我给全校本科生开设选修课程《国情与发展》，给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开设必修课程《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使他们一开始就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地理和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把这门课称之为清华大学学生们认识中国的“入门之课”，“终身受益之课”。

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所产生和创新的国情知识是一种公共知识，它本身具有正外部性；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这种知识产品还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当我们提供了这个具有社会价值的公共知识，它能够真正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有利于人民的福利，也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话，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知识贡献，所以我们国情研究的宗旨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就是为人民的福利和国家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有价值的公共知识。

中国发展知识正在变为全球性知识

我们研究国情实质上就是研究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有哪些现代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应当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发展？又是如何创新发展道路、应对各种发展挑战的？

随着中国越来越全球化、国际化和地区一体化，我们发现我们的很多中国知识又变成地区性、全球性的公共知识，因为中国在本地区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全球的发展起了越来越重要的发动机作用，世界各个方面都很关注中国的发展趋势和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不是能够可持续？如果可持续地增长又需要哪些条件？中国政府有什么政策和办法才能实现她的发展目标？

当然有不同的争论和预测：这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即将崩溃论”、“中国统计泡沫论”、“后奥运下降论”。国外对中国的看法不一，对中国的猜测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你不深入地研究现代中国，就无法辨别各种各样的“说三道四”，我们有了自己的高质量的情研究，就能够在各种国际场合上做到“摆事实，讲道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实际上，关于中国的知识愈来愈多，只要你查阅各种报刊或学术期刊就可以得以证明。其中关于许多中国发展的知识和想法 (ideas)，正在变为全球性知识和想法。我们怎样来理解呢？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社会的新时代，因为知识和想法是不分民族、不分国界的，又是广泛传播的。为了解决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充分动员全世界的智力资源，相互配合协调，逐步解决种种难题。中国所能够提供的发展知识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大国显得尤为宝贵，它既是“软实力”（吸引他国的能力），又是对穷国的“雪中送炭”（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发展知识）。例如中国是如何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中国是如何对外开放的？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从中不仅获益而且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就需要善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总结中国的经验，善于使

用他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介绍中国的发展历程和故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知识和想法。

中国持续高增长了28年，GDP增长了13倍，早已打破了日本创下的世界历史纪录（1955~2005年GDP增长了11倍）。如果中国继续增长下去的话，到2020年中国将用42年GDP增长42倍，那么会对周边国家乃至全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我们还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知识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地域太大，变化又太快，各地发展极不平衡，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不断地提供一些比较重要的当代中国知识。

“文革”期间，中国领导人对全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基于早期列宁的判断，即世界仍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不是革命的时代就是战争的时代，制定了“三反”（反帝、反修、反各国反动派）的国际战略。当今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不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世界发展和贸易的中心，既是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引擎之一，也是世界贸易增长的引擎之一，还是世界吸引FDI（外国直接投资）和进口高技术产品的中心之一，现在开始成为世界新的FDI投资国和ODA（官方援助）国，我们不是威胁别国，而是给别国带来利益，而这个利益又是相关的、互利的、长远的利益。

如何进行国情研究

我们把国情研究界定为三大导向：中国问题导向、发展挑战导向和公共政策导向的研究，它不同于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理论研究。我们所关心的是：第一，中国面临或将面临哪些问题是重大问题？第二，中国有哪些发展挑战对于我们具有紧迫性，或者说具有威胁性？第三，就是我们研究重大问题和紧迫挑战的战略与政策，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要为认识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相关的决策知识。国情研究本着“三个独立”的原则：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独立发表。

如何选择国情研究的重要课题呢？我们基本上是要选择国家所面临的必须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是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重大挑战问题。我称之为“换位思维”、“模拟思维”。

这种做法是参阅和学习1956年毛泽东研究国



The Economist杂志上关于中国威胁的封面

情的思路。他当时在研究中国国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谈话。我们研究国情的基本思路充分学习和借鉴了毛泽东的思路，在十分复杂的各类矛盾中抓住那些影响全局的重大关系，不仅提出认识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而且要进行大量的定量分析，历史的分析与总结，国际的比较与借鉴，未来的预测与选择，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进行系统的研究，提供系统的国情知识。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关注和分析哪些重要问题或重大关系呢？

一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

二是就业与发展的关系，《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扩大就业与失业挑战：中国就业政策评估（1949—2001年）》；

三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社会与发展》、《透视SARS：健康与发展》、《中国：新发展观》；

四是腐败与发展的关系，《中国挑战腐败》、《经济转轨、制度与腐败》；

五是中國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全球化挑战中国》、《中国：东亚一体化战略》、《中国崛起之路》；

六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国情与发展——中国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与长远发展战略》。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主题是发展，我们需要讨论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科学发展？如何更好更科学地发展？从1989年我出版第一部著作《人口与发展》之后，就是以中国发展为主题和主线，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研究它们与发展的重大关系。

如何独立从事国情研究呢？首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我称之为“务实主义”的路线，这有别于“教条主义”的路线。通常的学术研究，总会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或“华盛顿共识”，建立理论模型，并强制性来验证所谓“标准”理论。在国内的研究中，总会根据领导人或者主流思路，作政策解释或论证。前者是“本本主义”，后者是“唯上主义”，都不是实事求是。事实上没有独立的研究，也很难做到“实事求是”。

我仅举一个地区差距研究为例。改革一开始中国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先富论”，它是由邓小平最先提出的，从而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起飞；1988年中央政府正式实施沿海率先发展战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强调了“先富论”，并提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993年9月16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与他的弟弟邓垦谈话时已经预见到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将日益突出。同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正式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仍然主张“先富论”。这是当时的主流发展思路，反映了信息与知识的有限性和不完全性，因为这项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领域，在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有不同的作用，因而有不同的原则和做法。

1994年6月，我在经过实地调查和专业性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央政府应当把解决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放到优先位置：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该报告针对当时的争论焦点：改革以来中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启动

<p>6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决定，自2011年7月1日起，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今年试点范围覆盖全国60%的地区，明年基本实现全覆盖</p>
<p>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均可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p>
<p>参保居民要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政府对参保居民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p>
<p>参保居民年满60周岁，可按月领取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在内的养老金。基础养老金由政府全额支付，每人每月不低于55元，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p>
<p>已年满60周岁，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居民，不用缴费。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p>

国的地区差距发生了那些变化？这些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生什么影响？中国产生地区差距扩大以及发展不平衡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解决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如何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如何缩小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我的主要研究结论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已经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已是当务之急；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不是扩大而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不是“压高就低”、“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国际通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投资重点分配制度，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以缩小与全国人均水平的差距，进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解决欠发达地区问题，不是使用计划经济手段维系“输血”功能，而是通过有条件的财政援助和公共投资建立“造血”机制，同时欠发达地区应当学会利用差距，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通过改革和全面开放寻求快速发展。

面对中国各地区巨大的差异性现实，应采取什么样更为切合实际的发展政策呢？当时我们参照国际经验，前瞻性地提出实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实现全体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呢？包括基础教育、基本卫生医疗服务、基本计划生育服务、清洁饮用水供应、乡村道路、基本的通讯设施条件，这是与人力资本和现代化相关的那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而后我们就不断地重申这些观点和建议。

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个基本的公共政策提出来了。

因此无论是“实事求是”，还是“解放思想”，都需要以获取和创新国情知识为基础，真正做到更加科学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我想，这是国情研究最重要的原则。

观察中国要看森林整体的变化，而不只是看树木的个别变化。为什么？因为中国森林非常大，什么树都有，好的、坏的树样样都有，就看你喜欢什么，选择什么。另外我们特

别强调要看主流，事物发展既有主流也有支流，你怎么来判断？我们强调应该相对比较全面地、系统地来观测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否则你就会误读中国，误判中国，误解中国。诚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卡尔·瑞斯基（Carl Riskin）所言，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抨击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极其容易，忽视某些问题也是很容易的。

研究国情必须是开放式的研究。在“文革”十年，包括之前的十几年，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与西方同行是相互隔绝的，而且封闭时间太长，被政治（权力）统治和垄断的正常学术研究的时间太长。必须是开放性的交流，开放性地获取和学习知识，才有可能开放性地有效创新知识。我每年都要到国外作短期访问，参加各种研究会，作为“充电学习”、“知识投资”和“知识更新”。

既要研究国情，还有研究世情。不知彼，则不知己。这个彼不只是对手，而是全世界。不了解世界，就无法准确地了解中国；不具有国际视角，就无法深入地认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下，世界影响整个中国，世界改变整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影响整个世界，中国将改变整个世界。所以我们既要研究国情还要研究世情，就是世界的发展动态，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研究国情需要创新性的研究。如果你只是重

复别人的研究，或者是介绍别人的研究，解释别人的研究，也包括反驳别人的研究，而不是自己的研究，你就很难和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交流，也很难为其所承认。在研究当代中国方面，我们不仅有“天然优势”（即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其中，而且有“竞争优势”，有自己的创新研究，例如综合国力及国际比较研究，五大资本及国际比较研究，五年规划及历史比较研究等，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实践，源于自己的直接经验。

创新不仅要突破他人，还要突破自己，自我纠正。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实际上1994年已经发现），全国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在扩大，但是人类发展指数（HDI）在不断缩小，这反映了教育和健康发展指标在缩小。根据这项研究，我们建议用HDI来替代人均GDP，既有助于真正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不是简单的人均GDP差距），也有助于促进地方政府转型，从经济增长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更有助于实现全国各地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当代中国研究面临的挑战

关于当代中国研究，应当说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有些人也讲到，中国学或者当代中国研究，不在中国，而在中国之外。当代中国研究的确面临一些很大的挑战。

第一，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悖论，尽管我们是研究中国的，至少国际学术舞台主体还不在中国，也不是中国学者。无论是国际会议论文还是国际学术刊物，来自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比例还是相当低的。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刊物几乎都是英文或欧洲语言。

第二，中国学还没有形成我们称之为的系统的理论，也包括当代中国系统性的知识理论。在国际上，中国学的研究仍然是以美国学术界为主导，并将中国研究纳入西方理论框架和模式，其他发达国家专家紧跟其后，特别是在价值判断方面更是如此。

第三，中国学还没有形成高质量多学科的相对年轻的研究队伍。当代中国研究是一门相当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讲，都需要刻苦研究，扩展知识，长期积累，不断创新；不仅有多学科的专业化基础，而且有很强的写作能力和交流表达能力；不仅始终充满研究激情，富有历史责任感，而且还具有坚定的政治理念和丰

富的政治智慧。

第四，我们的优秀大学还没有中国学专业教育，也缺少有学术积累和国际影响的中国研究中心。主要发达国家中，几乎最好的大学和最重要的研究机构都有关于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不仅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长期的知识积累和人才培养积累，而且获得大量的稳定的资金资助，包括私人 and 政府的资助。像美国五所著名大学都有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密执根大学、斯坦福大学，还有中国学研究生培养项目；英国诺丁汉大学专门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院，获得英国政府的资助；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德国汉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院都有中国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都有很长的学术历史，近年来又得到了很大发展。日本早稻田大学既有亚太地区研究生院，还有亚洲研究机构和现代中国研究所。使我感触最深的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他们不仅设立中国学专业，而且获得韩国政府的大量资助，要求他们尽快培养出更多的中国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还没有正式的中国学的专业和学科。我的想法和愿望，就是在清华大学建立国际一流的中国研究中心。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们不仅研究中国，而且还参与中国的发展进程，与海外的中国通相比，这是最有利的条件，也是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第五，中国研究本身的挑战。现在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学不是简单的资料和数据汇编，而是按照社会科学或者其他科学方法，对这些原始的资料、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和上升为重要的理论。所以说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规范地去进行研究，以便于不仅你能够理解，还使和你交流的外国人能够理解，不仅学术界能够理解，而且进行社会各界的交流。另外就是学术引证或引用，这更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我把研究中国称之为在读一部“天书”，这部“天书”让你读得非常兴奋，同时让你难以读懂。尽管我已经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许多著作，但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知识还是“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国情研究，或者中国学研究，还是一条非常长的治学之路，任重而道远。作为一位中国学者，我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